

辛 斌 著

当代语言学丛书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

CRITIC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当代语言学丛书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

CRITIC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辛 斌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辛斌编著.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当代语言学丛书)

ISBN 7-81095-733-3

I. 批… II. 辛…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044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江雷红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90千字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733-3 / H · 283

定 价: 1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当代语言学丛书》

编委名单

主 编：黄国文 秦秀白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初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朱永生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东英 （香港理工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杨永林 （清华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顾曰国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当代语言学丛书》

总 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组织策划了《现代语言学丛书》，并于 1985 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心理语言学》（桂诗春著）。迄今这套丛书已出版 14 部著作。此丛书的主编、编委和作者都是我国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现代语言学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为推动我国的语言学研究 and 外语教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7 年后的 1999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策划了《当代语言学丛书》，邀请黄国文教授和秦秀白教授任丛书主编，并成立了由 12 位比较年轻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或博士学位获得者，对语言学研究 and 教学有很高的造诣。

近两年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先后引进了“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39 本和“牛津语言学入门丛书”6 本。这些著作在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考虑《当代语言学丛书》的组稿原则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处理好“引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阅读和钻研引进的原版书需要一定的英语基础；对于那些英语水平不太高的语言工作者和语言学习者来说，仍有必要用汉语为他们“引进”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引进，而是与国际学者对话，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国际相关的学术领域接轨。我们需要创新，也必须创新。因此我们希望《当代语言学丛书》的作者在引进和评论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能结合我国社会、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立足创新，勇于创新。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是高等学校的语言、翻译、文化等领域的教师

和研究生以及研习相关专业的广大读者。我们相信,汉语界的同人和读者也能从我们的这套丛书中得到他们需要的某些东西。

我们希望更多的新一代学者能加入我们丛书作者的行列,共同为提高我国语言研究的水平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策划和组织这套丛书。我国语言研究者将永远铭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在普及和繁荣我国语言教学与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也将与出版社一起为推动我国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当代语言学丛书》编委会

2000年2月

前 言

“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也叫“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在英国兴起的有关语篇分析方法的学科。它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批评语言学认为语篇是说话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意义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的方法论主要建立在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上,但也不排斥其他语言理论中有关的概念与方法。它在分析中特别强调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发现和分析语篇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因此往往被忽视的思想观念上,以便人们对它们进行重新审视。

批评语言学一出现便迅速得到西方语言学界的重视。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研究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的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它在英国、美国、荷兰、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等国方兴未艾,形成语篇分析的研究热潮。近年来批评语言学也引起了我国语言学界的重视,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迄今尚无对批评语言学进行比较有系统的研究的专著。这就是笔者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本书分为十二章,第一到第六章主要介绍、评析批评语言学 and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语言观和理论源泉等。批评理论的重点在于实践。在第七到第十一章里,我们力图把批评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对具体语篇的分析,以便验证其实用性和有效性。第十二章对批评语言学发展至今存在的问题和它所遭受的批评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和评论。总之,本书既有广泛的理论探讨又有大量的实例分析,理论与应用相结合,深入浅出,生动易懂。笔者相信本书对我国的英语语篇的研究和教学将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笔者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英国留学期间开始涉足批评语言学,启蒙老师是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 Henry G. Widdowson 教授,当时他为我们开设了一门课,叫做“语言、文化与意识形态”(Language, Culture and Ideology)。1994 年回国以后笔者开始有系统地将这一语篇分析方法介绍给国内语言学界,并以研究生为对象开设了“批评语言学”课程。在此期间,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国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内了解和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从 2000 年开始,在国内一些同仁的建议下笔者开始产生了把数年的研究成果疏理成书的想法。批评语言学是一种新兴的语篇分析方法,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多。因此,本书虽然包括了笔者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但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见,更因笔者水平所限,其中难免有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和不成熟之处,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笔者获得了许多专家和师长的鼓励与帮助,这其中首先包括 Henry G. Widdowson 教授、陆国强教授、朱永生教授、胡壮麟教授和张杰教授,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笔者特别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郑友苗女士在编辑出版本书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谨致谢意。

辛 斌

2005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语言和意识形态	8
2.1 意识形态：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	8
2.2 意识形态的本体论特征	10
2.3 意识形态的语言性	13
2.4 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	15
2.5 结语	18
第三章 语言和权力	20
3.1 权力	21
3.2 语篇里的权力关系	24
3.3 语篇里的权力斗争	29
3.4 语篇秩序与权力	31
3.5 语篇的非政治化和权力的习惯化	34
3.6 结语	36
第四章 语篇、常识和意识形态	37
4.1 意义的合法化和习惯化	37
4.2 常识的语篇功能	42
4.3 常识的意识形态功能	46
4.4 语境与意识形态意义	49
4.5 如何凸显语篇中的常识	52
4.6 结语	53

第五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1)	54
5.1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语言学	54
5.2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般方法	57
5.3 汤普森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	60
5.4 结语	64
第六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2)	65
6.1 分类	65
6.2 及物性	71
6.3 情态	74
6.4 转换	79
6.5 结语	81
第七章 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	83
7.1 新闻报道的选择性	84
7.2 英语新闻语篇的制作	87
7.3 英语新闻语篇的分析方法	90
7.4 两篇英语新闻的对比分析	92
7.4.1 语料	92
7.4.2 分类	96
7.4.3 转换	97
7.4.4 情态	99
7.5 结语	101
第八章 英语新闻语篇转述引语的批评性分析	103
8.1 转述引语及其分析方法	103
8.2 语料	108
8.3 消息来源	111
8.4 转述形式	114

8.5 转述动词	121
8.6 结语	124
第九章 语篇的互文性分析	125
9.1 互文性的分类	126
9.2 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128
9.3 体裁	131
9.4 体裁互文性	133
9.5 结语	139
第十章 主体位置、阅读位置和体裁互文性	140
10.1 阅读位置和主体位置	140
10.2 体裁互文性与主体位置的转换	143
10.3 结语	151
第十一章 “话语殖民”、“话语霸权”和体裁互文性	152
11.1 社会意识形态与体裁互文性	152
11.2 “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	156
11.3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158
11.4 公共语篇、私人话语和体裁互文性	160
11.5 结语	163
第十二章 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	165
12.1 语篇分析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解释的权威性来自何处?	165
12.2 关于混合型语篇(mixed texts)的描写有什么主张?	167
12.3 语篇、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168
12.4 语料是如何筛选的? 是否具有代表性?	170

12.5 与其他语言和认知的建构理论有何关联?	171
12.6 结语	172
主要参考文献	174
汉英、英汉术语对照表	192

第一章

绪论

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启蒙文化。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假定,“科学团体那种客观性、批判性和经验主义至上的文化将会使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完全脱离其所具有的社会特性(例如阶级、性别和国籍),而获得一种只对真理发生兴趣的理性的心智。这种立场与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知识的逻辑是格格不入的,并一直受到各派科学评论家的严厉质疑。”(塞德曼,2001:13)“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就是在这种质疑中诞生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当代西方人文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反唯科学主义和反唯理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尤其是德语世界,开始就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社会科学的主题和基本方法等方面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许多社会理论家,例如阿多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等认为,实证主义把科学或科学知识视为纯粹客观的东西,忽视了它与人类对技术控制的兴趣之间的联系。纯实证主义科学只限于所谓的“客观”描写和呈现“事实”,但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的,而科学家跟任何其他入一样具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1971,1973)提出一个批评社会科学(包括批评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知识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它与人类的兴趣密切相关。哈贝马斯指出,人类具有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兴趣”(the technical interest)、“实践的兴趣”(the practical interest)和“解放的兴趣”(the emancipatory interest)。这些兴趣分别来自于劳动、言语交际和权力(即支配和限制的关系),而劳动、言语交际和权力也是以下列三种科学为发展的基本条件:经验分析科学(包

括各门自然科学)、阐释学(包括各门文化科学)和批评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目标是获取人类控制外部生存条件必需的技术知识,因此它与人类的技术兴趣相关。文化科学的主要目标是取得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这种相互理解和协调不仅是自然科学获取技术知识的先决条件,它们对于人们克服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各种误解和隔阂也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科学与人类的实践兴趣相关,因为人们想在社会中成功地发挥作用,他们之间就必须消除误解,保持交流。

解放的兴趣是指人类把自身从各种自我强加的限制、暴力和导致歪曲交流的各种条件之下解放出来的兴趣。哈贝马斯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通过人的意志和意识加以创造,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非理性的东西,例如支配、压制和对个人行为 and 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既然人类的自我理解容易受到往往是隐蔽的各种条件和限制的制约,人们就有必要不断地通过反省来克服或消除这些条件和限制:“反省使人们意识到自我修养和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当前的实践和人们对世界的观念;反省导致顿悟,因为它使此前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得到认识:分析性的洞察介入生活”。(Habermas, 1973: 22—23)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对获得自身解放的兴趣构成了以促成反省为目标的批评科学的主要动机,而批评科学又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类所有社会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科学。科学家必须进行反省,他们必须考虑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他们必须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是在真空或象牙塔里进行的,它受到各种兴趣(包括科学家自己的兴趣)的影响,因而有其自身的准则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把科学家视为自然界的观察者和解释者,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是社会的成员,每人都有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么,“每一门把客观意义包括在其研究对象领域中的科学都不得不考虑到解释者的参与角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解释者不必赋予他所观察到的事物以意义;但他必须阐明所观察到的结果的特定意义,这种意义只能通过交流过程中的上下文而被理解。理论知识要拥有客观性需要一个独立的在价值观上属于中性的环境,而正是这些意义影响着这种环境”。(Habermas, 1990: 28)

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论包括三个层次,上述关于认知兴趣的理论属于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历史的理论,即批评科学必须考虑到言语交际和社会交往的历史生活环境;它必须认识到它所分析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环境并非是天赋的而是来自于生活,因而必须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加以理解。当一位批评家在解读某一语篇时,“如果解读者目前碰到的困难在该语篇被生成的时候并不存在或者并不那么难以解决,那么他就必须阐明作者当时假定的其受话人所共享的知识。……如果解读者自己意识不到作者在必要时可能提出的理由,他就不可能理解一个语篇的语义内容。”(Habermas, 1990: 30)第三个层次是实际的分析,即分析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以便识别其中潜伏的危机、支撑这些危机的意识形态以及那些能够参与解放过程的社会群体。

对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的批判和抵制见诸于许多 20 世纪西方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例如,巴赫拉德(Bachelard)在区分普通知识和科学知识时指出:“关键的是,反映相对于感知,它处于优先地位。……人类通过科学技术获得的东西在自然界里并不存在,甚至也不是自然现象的自然结果。”(Bachelard, 摘自 Hak & Helsloot, 1995: 5)在巴赫拉德看来,实验证据是人为创造的:“现象必须经过工具的筛选、过滤、纯化、成形;的确可以说是工具首先生产了现象,而工具只不过是物化了的理论。由此产生的现象整体上带有理论的烙印。”(同上)柏瑟(Pêcheux)在一篇以“Herbert”为笔名的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尚未完成与意识形态的必要的认识论决裂,所以它产出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因此,他认为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是科学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社会政治实践的目标主要是以保持整个社会结构不变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延伸。(Herbert, 1966)在另一篇文章中,柏瑟区分了意识形态的两种形式:来源于技术的“经验意识形态”(empirical ideology)和来源于政治的“思辨意识形态”(speculative ideology)。柏瑟使用语言学术语对意识形态的这两种形式的不同作用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经验形式指的是词义与现实的关系,而思辨形式指的

是词义之间在话语的总体形式下的相互连接。借用语言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的经验形式突出的是一种语义功能——能指和所指的符合，而其思辨形式突出的是一种句法功能——所指相互之间的联系。”(Herbert, 摘自 Hak & Helsloot, 1995: 9—10)意识形态过程必须被理解为语义作用和句法作用的结合。柏瑟认为，社会科学只通过经验的手段研究话语，对思辨形式的意识形态却视而不见。

自 20 世纪以来，哲学家、文论家和语言学家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把语言视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和个人生活的干预作用。塞尔顿(Seldon)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家能够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妄称语言是一种自然透明的媒介，读者能够通过它理解一个可靠的和统一的‘真理’或者‘现实’。”(1985: 74)柏瑟也反对把语言只看作人们相互交换信息或者交流意义的一种工具，因为语言工具论视信息和意义为不依赖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柏瑟认为，这种语言观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它在人文科学中的作用是掩盖或模糊各人文学科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把它们置于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Herbert, 1968)。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语言在其运作中把“能指”(signifier)置于高于“所指”(signified)的权威地位。他是这样描述能指、所指和说话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能指在决定某些作用中具有主动功能，在这些作用中能被表达的事物通过变成所指而似乎从属其符号。能指的这种主动功能现在变成了人性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不仅仅是人在说话，而且是它在人的内心和人说话；人性由一些结构构成，其中包括语言结构，在语言结构中人变成了它的材料；因此，在人的内心存在着言语的联系，这是观念心理学所不能理解的。”(1977: 284)拉康在这里强调了说话主体的被动性，间接地否定了语言是一种透明媒介的观点：是语言通过主体说话而不是主体通过语言说话。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是语言在说话，而不是人在说话。”(霍克斯, 1987: 164)

要理解拉康和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运行就像下棋的比喻(Saussure, 1983: 87—89)和伽达默尔(Gadamer)的“语言游戏”概念。伽达默尔把艺术理解中的语言性

或对话规则比作游戏规则:游戏的特点在于,它具有一套不以游戏者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独立的规则体系,游戏人只有适应并遵守这套规则体系才能从事并享受游戏。因此,“游戏的主体并不是游戏者,游戏是通过游戏的实践者才得到表现的”。在艺术理解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作者或读者,而是“艺术作品本身”。艺术理解的语言性就在于艺术的内在语言秩序对于主体构成的关系。艺术的语言秩序是真正的主体。(王一川:205)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干预作用和对其使用者的世界观所能施加的影响:在许多语言中动物被分类成“宠物”和“非宠物”。自然界中原本并不存在宠物或者非宠物,这种区分完全是人类通过其语言强加给自然界的,而这一分类反过来又必然影响或塑造人的思维和世界观。语言就是这样赋予世界以意义并按照人类的兴趣、价值观和行为对它进行分类和组织的。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我们对“庄稼”和“杂草”的区分。这绝不是植物学的分类而只是一种符号学的分类:它来源于园艺文化和农业文化中人们的兴趣和风尚并被汉语和许多其他语言所编码。

正是基于上述语言事实和哲学社会学理论,福勒(Fowler)和其他批评语言学的创始者才感觉到对话语或语篇进行批评性语言分析是必要的:“流行的正统观念认为,语言学是一门描写学科,无权对它所分析的材料进行评论;它既不规定用法也不评价所调查的事物。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存在具有不同的目标和程序的语言学分支,既然语言运用充满了价值,那么实践一种旨在理解这种价值的语言学似乎是无可非议的;这就是已为人们所知的批评语言学。”(Fowler, 1991b: 5)“批评语言学”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福勒等人于1979年出版的《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这本书里。在十年之后的1989年,费尔克劳(Fairclough)在他的著作《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中又提出了“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这个概念。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把传统的文学文体学的理论和方法用来分析各种非文学的大众语篇,例如新闻报道、广告、入学指南、游泳馆规定等等。分析的目的是考察这些语篇中蕴涵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